

# 比较政治视角下哈萨克斯坦威权现代化悖论

朱雪婷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 本文从比较政治的视角切入,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政治经济转型的案例研究, 挑战了“经济发展必然导向民主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旨在揭示资源型威权国家实现发展与维持稳定背后的独特逻辑与内在张力。哈萨克斯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威权现代化模式, 其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 构建了一个“权力-资源”互锁的闭环。这一结构虽在初期有效整合资源、驱动能源繁荣, 但也系统性地催生了“治理诅咒”——政治上的权力个人化与经济上的寻租联盟相互强化, 最终导致国家陷入稳定与发展的悖论。文章将从政治结构、经济模式与转型调适三个层面, 系统剖析这一悖论的形成、运作与危机。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 威权主义; 现代化; “治理诅咒”; 超级总统制

**DOI:** 10.69979/3029-2700.26.04.084

1991年苏联解体后, 其加盟共和国普遍陷入国家建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的复杂现代化困境。在这一宏大的转型实验中, 哈萨克斯坦的路径显得尤为独特, 它并未遵循经典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经济发展将导向民主巩固”的线性路径, 而是走出了一条“没有民主化的政治稳定”的威权现代化之路。在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及其继任者托卡耶夫的先后领导下, 该国构建了以强总统制为核心、以维护秩序与推动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强国家发展模式。可是, 这一看似成功的模式内部, 蕴含着深刻的威权主义悖论。

## 1 权力集中与适应性威权

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 意识形态的缺位与国家权力体系重构为宗教激进主义提供了渗透空间。面对极端势力的挑战, 威权体制凭借其高效的资源整合与强控制力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现实选择。此外, 草原部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强人尊崇”意识, 构成了传统型权威的社会心理基础。纳扎尔巴耶夫则通过“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路线取得显著成效, 塑造了兼具个人魅力与制度外壳的权威形象。

1993年宪法虽在名义上将哈萨克斯坦界定为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世俗和单一制共和国, 但新体制的短暂磨合期远不足以厘清所有权力边界。这种制度设计的模糊性, 特别是对总统制缺乏明确认定, 这直接导致了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对于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夺。1995年3月, 哈宪法法院裁定1994年最高苏维埃选举违宪并将其解散, 此举清除了制度重

构的主要障碍。随后通过的1995年新宪法, 从根本法层面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塑: 它不仅正式确认实行总统制, 更将原属最高苏维埃的诸多核心权力转移至总统名下。由此, “强总统、小议会、弱政府”的权力格局以宪法的形式被固定下来。1998年的修宪举措, 将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至7年, 同时调整了议会上下院的任期。

2000年7月, 纳扎尔巴耶夫通过推动《首任总统法》立法程序, 以宪法形式确立其终身特殊权利地位。该法案不仅赋予其主持人民大会的特权, 更通过法律条文明确其对继任者及核心政府成员的提名权, 实质上构建起“超总统制”权力架构, 使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向集权化方向演进。这种以巩固权力为导向的策略, 其效果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得到集中体现, “议会被总统控制, 按政党比例制选举产生的议员全部来自总统担任党主席的“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 其他政党无一获得席位。2010年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法案, 赋予纳扎尔巴耶夫“民族领袖”地位, 使其享有免受拘留、逮捕的特权, 且卸任后仍保留影响力, 这进一步体现了总统权力的制度化扩张。在2011年、2015年, 哈萨克斯坦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纳扎尔巴耶夫均以高得票率成功连任, 直至2019年主动卸任。这一系列选举结果不仅反映了其政治影响力, 更体现了其作为“国父”的魅力型权威对国家政治稳定的长期作用, 但也导致政治改革滞后、官僚体系僵化, 为后续权力交接埋下了隐患。

2019年, 哈萨克斯坦开启了独具特色的政权交接方式, 纳扎尔巴耶夫通过2017年的修宪和2018年颁布《安

全委员会法》等方式在卸任后仍保持了其权力地位，形成了过渡时期的“双重权力中心”格局。2022年的“一月事件”的爆发，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2022年3月的国情咨文中，托卡耶夫明确指出：“一月事件”不会减慢哈萨克斯坦现代化的步伐，相反，它将加速各个领域的系统性转变。9月1日，托卡耶夫再次发表国情咨文，进一步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改革计划；随即，哈议会通过对宪法的再次修正案，将9月国情咨文中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付诸实施。托卡耶夫总统推动的宪法改革，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进入了一个旨在解构“超级总统制”的制度性分权新阶段。

## 2 资源红利与转型困局

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转型，是该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更是核心驱动力所在。但在其创造“哈萨克斯坦奇迹”的同时，也系统性的扼杀了经济内生性转型的动力，使其现代化进程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结构性困局。

哈萨克斯坦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已探明石油储量世界第九位，煤炭储量排名第八，铀储量排名第二，但其经济转型步履维艰。独立之初推行以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后，却因低效的管理、腐败及外部金融危机等内外因素的交织，导致其经济潜力在2000年之前未能得到充分发挥。21世纪初全球能源繁荣，使哈萨克斯坦的资源禀赋转化为真正的“资源红利”，并成功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这种能源驱动的增长很快诱发了典型的“荷兰病”，而威权治理模式则系统地固化了这一病症。在政治上，掌握经济命脉的精英集团天然倾向于将资本投向能快速产生巨额租金、且易于控制的能源采掘业，而非周期长、风险高的制造业。在经济上，资源转移效应不仅意味着市场驱动的资金流动，更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投资、信贷政策乃至外资引导，都系统性向能源部门倾斜，这加剧了资本与劳动力从制造业的流出，形成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同时消费效应带来的本币升值和通胀，在削弱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为寻租联盟创造了购买海外资产的便利，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资本的净流出。

为规避“资源诅咒”，实现可持续发展，哈萨克斯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跨越周期的多元化探索。其政策演进呈现出清晰的轨迹，从独立之初先后颁布和实施《外国投资法》和《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积极设立各种

经济特区以更广泛地吸引外资；到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2030战略”、“2050战略”等宏大蓝图以引导长期投资；再到托卡耶夫总统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将改革矛头直指经济结构痼疾。然而，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战略，在触及能源部门既得利益时，无一例外在实践中遭遇了失败，其根本阻力源于一个与威权政体深度绑定的“寻租联盟”。该联盟为维护其在能源领域的垄断租金，对触及核心利益的改革发起了系统性的“软抵抗”，表现为行政审批的故意拖延、信贷资源向能源关联企业的倾斜，以及将国家投资扭曲为服务于集团利益的“形象工程”。这种抵抗最终导致国家战略被制度性吸纳，无法触动“权力-资源”的闭环。

这一联盟的运作遵循着清晰的利益循环逻辑，共同利益在于维持资源开采业的超额利润，其核心行为模式并非创新与竞争，而是围绕租金分配的合谋。“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造成行业垄断，催生权力寻租现象，并导致社会矛盾频生、腐败屡见不鲜的恶果。”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与资源部门形成的“寻租联盟”扭曲了资源配置，使大量本应用于多元化发展的资本和优惠政策，被固守在资源开采和初加工领域，难以真正导向新兴制造业和创新产业；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大力引资，但外资大部分仍涌向能源采掘业，对技术外溢和产业联动的贡献有限。

## 3 绩效合法性危机与威权模式的调适困境

外部经济的周期性冲击，不断暴露着哈萨克斯坦资源依赖模式的脆弱性，并最终动摇了其威权统治的根基——绩效合法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虽凭借石油繁荣期积累的储备得以缓冲，但其动用国家基金实施财政刺激的应对方式，无形中强化了依赖租金的发展惯性。随后的2014年油价暴跌与2020年新冠疫情，则彻底暴露了该模式的极限。为弥补财政缺口、稳定社会，国家基金(NFRK)被大规模消耗，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本币大幅贬值。这种绩效合法性的危机，在2022年的“一月事件”中得到了总爆发。与此同时，资源收入的收缩也激化了“寻租联盟”的内部矛盾，导致精英内斗公开化。

面对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托卡耶夫总统的改革展现了一种“精明威权主义”的典型策略。所谓“精明”体现在其策略的双重性上，一方面，他通过修宪、设立宪法法院等制度性分权举措，解构纳扎尔巴耶夫的“超总

统制”，回应了社会对政治现代化的呼声；另一方面，他通过人事清洗与权力重组，将权力重新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新体系中，实现了去纳扎尔巴耶夫化而非去威权化。这种改革的目的在于修复体制的合法性，而非改变权力的来源。它与新加坡等国的威权模式具有相似之处，均体现为“一党独大、强人政治和精英治国三个特征”。但其与新加坡威权模式形似神离，则揭示了恩庇网络与法制型精英治国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这些改革尽管在表面上推动了某种“制度化”，但其根本目的仍是维系威权统治。它未能也无意触动“权力-资源”互锁的核心，反而通过一种更精巧的方式，尝试构建一个以新任领袖为核心、更具回应性的新威权平衡。

上述危机与调适的过程，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治理诅咒”，即支配资源的绝对权力，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性制约，反而成为阻碍国家进行创造性自我革新的终极障碍。哈萨克斯坦的案例超越了传统的“资源诅咒”解释。其与挪威等国的根本差异，不在于资源本身，而在于支配资源的治理结构。挪威凭借法治、透明与权力制衡，将资源财富转化为全民福祉与创新动力；而哈萨克斯坦的超级总统制，虽能高效动员资源，但其与恩庇网络的深度绑定，却系统性地扼杀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内生动力。

#### 4 结语

哈萨克斯坦的现代化道路，以其“没有民主化的稳定”这一鲜明特征，对经典的线性现代化理论构成了深刻的挑战。哈萨克斯坦的案例超越了传统的“资源诅咒”论，它清晰地指出，对于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具有类似政经结构的国家而言，真正的转型瓶颈不在于资源，而在于权力。能否打破“寻租联盟”对经济命脉的垄断，能否将个人化权威成功转化为非人格化的制度效能，是决定其能否跳出“治理诅咒”循环的关键。

纵观全球，资源型威权国家的转型困境昭示了这场治理革命的艰巨性。而其他成功实现持续发展的后发国家经验，包括中国对长期战略规划与科技创新的坚持，则从侧面证明，将资源财富转化为全民福祉与内生动力，

离不开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制度化的治理框架。因此，哈萨克斯坦的未来，乃至同类国家的命运，最终将取决于它们能否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成从个人化威权向制度化治理的根本性跨越。可持续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一场深刻的治理革命。

#### 参考文献

- [1] 朱成虎. 十字路口: 中亚走向何方[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7.
- [2] 张宁.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 1991~2011[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9.
- [3] 包毅. 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4] 赵常庆. 哈萨克斯坦[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5] 赵丹, 孙壮志. 现代化理论视域下的“新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 动因、特征与前景[J]. 世界民族, 2023, (03): 13-25.
- [6] 田培利. 林兹威权主义理论的局限与超越[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2(6): 37-46.
- [7] 张友国, 林培源. 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权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0(2).
- [8] 贺卫, 王浣尘. 政府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研究[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 (8).
- [9] 吴宏伟, 张昊. 部落传统与哈萨克斯坦当代社会[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4, (06).
- [10] 张宁.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M].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 [11] 苏萍. 中亚哈萨克斯坦超级总统制评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44(04).
- [12] 王富忠. 权力交接中的哈萨克斯坦政治体制变革[J]. 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 2020(6).
- [13] 赵常庆. 哈萨克斯坦的2030/2050战略—兼论哈萨克斯坦的跨越发展[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03).